

海不刮风 故能成其大



“海不刮水,故能成其大”,这是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引用的一句古语。这句话出自《管子·形势解》,较完整的表述是:“海不刮水,故能成其大。山不刮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虐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废学,故能成其圣。”

故能成其大

首先出自百家传世著作中,《管子》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一部,儒、道、法、兵、名、阴阳等诸家思想无所不包,天文、时令、舆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等方面知识无所不及。同时,虽然该书冠以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号称“华夏第一相”的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管仲之名,但很大程度上乃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甚至更晚时期诸贤的集体创作。诚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言,《管子》“非管仲所著”;另一位南宋学者叶适也判定,“《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今本《管子》乃汉代学者刘向博洽综研编订而成,至今仍传世七十六篇。而习近平主席引文所出的《形势解》,列为第六十四篇,是该书存世的四篇“管子解”之一。顾名思义,《形势解》可谓对《管子》第二篇《形势》的阐释发微之作。唯有准确地理解何谓《管子》所论之“形势”,方能更好地认识“海不刮水,故能成其大”的奥义。

所谓“形势”,今天多指国际、国内的时事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而其古义,则包含人事上的强弱盛衰之势、地形上的高下平险之势乃至行军的阵势。“形”“势”二字,在今人看来,其连用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鲜少注意对二者加以个别的解说。甚至连《管子》两个最负盛名的英译本,即美国汉学家李克(W. Allyn Rickett)和中国学者翟江月的译本,对《形势》篇名的译法除使用Xing Shi外,也分别译为On Conditions and Circumstances及The Situation。实际上,且不论“形制之势”“形格势禁”“势合形离”等成语,《形势》及《形势解》中的“形”与“势”原本便是两物,与今日词义相去甚远,不可不察。虽然《隋书·经籍志》将《管子》列入法家类,但更早的《汉书·艺文志》则将其列入道家类。毋庸讳言,该书具有很强的道家成色。道家典籍《老子》第五十一章有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张岱年先生解释说:“一物由道而生,由德而育,由已有之物而变形,由环境之情势而铸成。”所谓“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其存在的形态和道理(“形”),亦有其发展的态势和能量(“势”)。

可见,由事物的当下外在形态之“形”,可推知其内在规律与发展前景之“势”;高山大海强国贤人之“势”,离不开不刮水不刮土不虐人不废学之“形”。这就又让我们想起《老子》第六十三章提出的“大小多少”的辩证法:“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于是乎,“海不刮水,故能成其大”,而“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当然,《管子》自有其时代和阶层的限制,需要做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期开出古圣先贤观山观海关怀天下的当代意义。面对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不刮水”,不是为了称王称霸、穷兵黩武,而是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以邻为壑大行其道、个别极权国家奉行单边主义之际,主动开拓出更为宏阔的天下格局;“成其大者”,亦不再是谋求一国之大,而是促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大。“海不刮水,故能成其大”,则强调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大陆的非洲,已然结成并将巩固和发展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进而在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非洲人民团结振兴的非洲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作者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地农用”原则 碰不得

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北方地区城市周边“大棚房”问题呈现蔓延之势,不少地区出现违法占地建设住宿餐饮、休闲娱乐等经营性场所等问题。为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乱象,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任凭“大棚房”问题蔓延,将对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造成重大冲击,同时背离国家农业扶持政策初衷,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坚决遏制“大棚房”问题蔓延势头,必须不折不扣地坚守“农地农用”原则。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论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丝毫闪失。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农村承包土

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防止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走弯路。耕地不能非农化,“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是应对全球经济各种不确定性的一大“家底”。当前,我国在落实“农地农用”原则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各地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建立问题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工作机制,在完善监管政策的同时,使各项涉及农地的政策规定明确、细则精准,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便于认定、易于操作。

(原载于新华网 作者:王立彬 摘编:刘朝)



诗词文化普及不能止于记诵

□ 宋春光

文化评析

在近日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中,古诗词相关的图书、分享会、谈话活动等都备受读者青睐,这也是近年来古诗词热的一个缩影。而包括《中国诗词大会》在内的电视综艺节目热播,正展现了人们对古诗词文化的热爱。但若要避免古诗词文化成为“快餐文化”,使其能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滋养读者的心灵,把握古诗词文化普及的方向并作为有效的引导,是至关重要的。

古诗词文化的普及,首先要面

向的问题就是,所谓“普及”究竟指向何处?目前来看,社会上对古诗词的弘扬,着力点主要在于记诵。古诗词文化的普及固然应包括记诵乃至创作,但仅停留在这些“技”的层面实则并非真正的普及。我们的社会既不需要“有脚书柜”,也不期望人人都成为诗人。古诗词及其传承有其自身的特性。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诗词所承载的是人的情感。而一首诗词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这是我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选择的结果,这些诗词中的“意味”也因此而包含了历史合理性。

其次,我们也应认识到,诗词中的这些“意味”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理解与体认中被不断丰富,从而不断生成利于社会发展的、深契我们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的“意味”。古诗词中的每一个意象与典故,所承载的都是人们的情感积淀与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吟诵古诗词的过程,其实也是对这些“意味”产生情感认同和审美体认的过程,将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诸如“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这些经典的诗词,它们各自虽有其不同的风格与历史文化语境,却往往蕴含着相似的主题: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本真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情感的珍视。而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也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中所传达的对于人生的思考与选择具有跨越古今的普遍性意义。因此,长期的吟诵与体会便会使这些诗词中的意蕴积淀到人们的文化心理中,对人的价值建构与心灵成长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今天,古诗词文化普及所指向的,应是每位读者道德和情感的自觉能力的提升,而每一个个体人文素质的提升,也将为我们民族走向未来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记诵是我们体认古诗词的途径,以记诵为评判标准的文娱节目对于古诗词文化传播也确有其借鉴意义,但仅从记诵层面“普及”古诗词文化,其局限性是不言自明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学者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体认、解读古诗词的文化意蕴,为读者与古诗词之间架起有效的桥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前教育须先“退烧”再“调理”

□ 交予

近日,北京出台学前教育管理新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的意见》,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着眼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保障幼儿健康成长。这是继朝阳区偶发“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之后政府出台的最为系统全面的文件,我们应该为之点赞喝彩。

北京新政可谓“标本兼治,系统施策”,既有管眼前、预防发生恶性事件的,如增设法制副校长、配备安全员、要求看护幼儿时两名工作人员同时在场等措施;又有管长远、从根本上解决办园质量低问题的措施,如健全师德师风承诺及教师心理疏导制度、逐步实现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同工同酬、探索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工资保障机制、组建学前教育督查管理队伍等。笔者认为,囿于公共财力人力

资源,一定要突出时时要,分清先后,先“退烧”,把最首要的安全稳定问题解决好;再“调理”,逐步解决学前教育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保障上的欠账大问题,切不可四处用力,出台大规划又迟迟难以见效,而幼儿安全问题却此起彼伏不断出现。

第一记“退烧”贴是晒晒“日光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幼儿园办学行为既需要家长了解、参与,更需要家长监督。我们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家长委员会、志愿者制度,让孩子的游戏活动和饮食起居“透明”起来,坚决避免在暗处发会风潮,让每一名教师在享受和践行神圣中自律自强。

第二记“退烧”贴是亮出“警示牌”。幼儿是最弱小的群体,对幼儿的保护要用最坚决的态度。幼儿安全事件虽然不多,但影响极

大、波及极深、后果极坏。要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以儆效尤,避免积小成大,传染情绪,带坏社风,同时要教育广大幼儿园教师和保育人员常怀敬畏之心,常思作恶之害,不敢心存侥幸。

第三记“退烧”贴是高筑“道德坛”。教师是神圣的职业,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百年人生,始于幼学,塑造幼儿的灵魂对教师自身灵魂的要求,比任何一个学段都更高。要创新手段广泛宣传优秀学前教育的事迹,家喻户晓,树立幼师师德高于天的社会风尚,让每一名教师在享受和践行神圣中自律自强。

第四记“退烧”贴是珍视“老人言”。学前教育主要任务不是传授文化知识,而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养成良好习惯。在师资力量水平普

遍不高的状况下,培育和推广好的游戏和管理模式比下大功夫提升教师学历、增加编制更为经济可行。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遵循“老人言”,遴选一批老园长、老教师,研究开发好的办园模式、游戏模式,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迅速培训推广,加快解决幼儿教师不会教、不会保育的问题。

当然,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办好学前教育”的要求,从长远看,还是要靠“调理”。必须通过积极挖掘、规范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等途径整体扩大学前教育规模,刚性占比公办园和低成本民办园名额的占比,使绝大多数的幼儿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要出台并落实生均拨款标准或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完善成本分担机制。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出台教

师配备标准并配齐教师,加大教师培养培训力度,提升学前教育保教水平。要约束社会资本兼并收购、加盟连锁、协议控制公办园或非营利性幼儿园行为;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社会力量办园。

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成就斐然,另一方面新矛盾不断出现。教育领域诸多现象作为社会各领域深层次问题的投射,更是如此。这不禁使人想到中小学生学习校外培训热、致使学业负担重问题,有关部门采取的路径也是先“退烧”再“调理”,即先治理培训机构安全隐患、无证无照等火烧眉毛的问题,确保学生基本安全,再着眼长远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秩序。由此可见,这已成为当今社会公共治理中解决热点难点的一种有效策略。

重奖教学名师是大学该做的事

□ 封寿炎

今年教师节前夕,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分别获得百万元重奖。北京理工大学向两院院士、著名雷达系统专家王越先生颁发“终身成就奖”和100万元奖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向中国首驾无人驾驶飞机“北京五号”总设计师文传源先生颁发了“立德树人成就奖”和100万元奖金。据报道,两位教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视热爱教学工作。王越先生已经86岁,仍在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已是百岁老人的文传源先生,还是始终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以不服气、不服老的精神带动学生不懈进取。

对于大学和大学教师来说,如何处理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始终是

一道难题。处理好了,两者就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处理不好,两者就有可能成为一对矛盾,顾此失彼。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我国,长久以来,教书育人一直都是教师的最大本分。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拿这句话来定义教师已经立于片面。尤其是对大学教师来说,仅仅教书育人已经不够,还要有科研创新的能力。现代社会的知识、信息和技术高度密集,大学除了培养学生之外,还是生产知识、产生思想和创新技术的最新前沿,除了教书之外,贡献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也成为其基本职责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研究

型大学来说,如果教师不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拿不出专业领域内认可的科研成果,那么这样的教师也很难被认为称职的。

可见,大学教师重视科研,这一点并没有错,而且十分必要。但是,重视科研不能以牺牲教学为代价。如果绩效考核和评价标准过度倾斜于科研,那么教学的价值就会被消弭,教师花在教学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受到挤压,大学教书育人的职能就会受到削弱,最终也会影响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从现状看,一位年轻教师因为发表一篇权威论文就能获得巨大资源,这样的新闻并不鲜见。但像前述两位老教授这样,因为教书育人的成绩获得百万元奖金,这种新

闻就比较鲜见了。同样,在什么级别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就能评什么职称,这在职称评定机制里有着明确的标准和通道,但因为教学成绩出色而获评职称,就往往是没有规定可循的破例之举。我们欣喜地看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最近,南京理工大学推行职称改革,教师只要教学成绩突出,即使没有论文也能评上教授。这一举措成为业内热议的新鲜事,恰恰说明这种做法属于“小众另类”。在更多的高校里,“唯论文马首是瞻”的格局还难以撼动。

重科研、轻教学现状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在现实中,因为论文数量、期刊级别容易量化考核,可以互相比较,因而往往成为学术研究

领域的“硬通货”,在评估大学实力和教师绩效时容易被采纳。与此相比,教师给学生上课的教学质量很难量化考核,也很难拿来直接比较,所以在考核评价机制中就往往由于难于操作而被弱化。可见,要扭转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健全完善大学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比如,将教师的教学时间、教学质量纳入考核范围,为教学型教师提供专门的考评渠道,使他们获得有别于科研型教师的职称上升通道。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激励大学教师勇攀科学高峰,另一方面也重视教学、倾心于教书育人,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双丰收。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扶贫领域岂容作秀行骗

□ 胡印斌

据报道,前几天,一个名叫史润龙的人因为“扶贫英雄”的身份火遍网络。他自称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是多家企业董事长,担任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某某龙,男,2001年8月出生,山东省济南市人,初中肄业。为满足个人虚荣心,编造了“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等各种头衔,找人代写文章,PS图片虚构场景,并在网上进行发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至此,这场看起来是有关荷尔蒙与虚荣心的00后青春恶作剧,似乎该收场了。

然而,从目前网上披露的情形看,问题似乎并非一场闹剧那么简单。一个看上去文弱的青年,何以掀起这么大的波瀾?事件的背后,会不会有神秘之手的操弄?

比如,他的“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头衔,仅仅是杜撰了一个不存在的机构吗?又如,他在网文中表述扶贫意愿的“全句”,“当我看着某一群人顺眼时,便会一帮到底”等,也充满着对公众心理的掌控感。事出反常必有妖,围绕着他的种种传言,无疑承载了太多不确定的信息,让人疑窦丛生。

撇开这些传言,仅就史润龙的故事看,也存在很多疑问。那些漏洞百出的所谓报道究竟是怎样发出来的?网站的审核机制是如何落实的?以假冒新华网名义发布的《新华网评:“扶贫英雄”史润龙扶贫金句引发的社会思考》文章为例,该文曾被多家网站全文配图转载。这显然不是史润龙自行发布,而是媒体转载的,此事究竟是无意还是有心,恐怕需要一个解释。

此外,史润龙“扶贫英雄”的人设,也有必要引起各方警惕。

当下,脱贫攻坚正在进入关键时期。如期在2020年告别贫困,是一个硬目标、硬指标,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同时,越是任务紧,越是要防范出现形形色色的乱象。动员、引导社会力量投入扶贫,并非不可,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侥幸心理,不能动不动把“扶贫英雄”当作噱头,附会上华而不实的经历,变成一场场舆论炒作。

扶贫需要扎实的长期努力,这里不是所谓“英雄”的江湖,也不是骗子的秀场。脱贫攻坚最终的成功,仍依靠千千万万的各级干部与普通民众,他们才是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的真正英雄。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中国新闻奖专栏